

新民主主義論  
參 考 文 件



南昌大學新民主主義論教研組印

一 九 五 三 年 一 月

# 目 錄

## 第一部份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一
真理報社論：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的偉大貢獻……………	五〇
——論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五〇
人民日報社論：斯大林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偉大論著給我們以新的思想武裝……………	六一

## 第二部份

莫洛托夫在蘇聯共產黨（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	六七
赫魯曉夫關於修改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的報告……………	七〇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總結報告（報告人馬林科夫）……………	八六
薩布羅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一九五一——一九五五蘇聯發展五年計劃的指示的報告……………	一四五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關於薩布羅夫同志的報告的決議……………	一七一
貝利亞在蘇聯共產黨（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一九一
布爾加寧在蘇聯共產黨（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二〇五
米高揚在蘇聯共產黨（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二一七
斯斯洛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二二九
伊里切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二三五
米哈依洛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二四〇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二四六
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	二四八
劉少奇在蘇聯共產黨（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致詞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脫詞	二五三
人民日報社論：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國際意義	二五五

### 第三部份

別爾烏辛關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五週年的報告	二五九
---------------------------	-----

#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斯大林

——給經濟問題討論會的參加者

##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我已收到因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而舉行的經濟問題討論會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對改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的建議」，「對消除未定稿中的錯誤和不確切處的建議」，「關於爭論問題的說明材料」。

對於這一切材料，以及對於教科書未定稿，我認爲必須提出如下的意見。

### 一、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

某些同志否認科學法則的客觀性質，特別是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法則的客觀性質。他們否認政治經濟學法則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過程的規律性。他們認爲，由於歷史所賦予蘇維埃國家的特殊作用，蘇維埃國家及其領導者能廢除現存的政治經濟學法則，能「制定」新的法則，「創造」新的法則。

這些同志是大錯特錯了。顯然，他們把下列兩種東西混爲一談了：一種是科學法則，它反映自然中或社會中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過程；另一種是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它是依據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並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這兩種東西無論如何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馬克思主義把科學法則——無論是指自然科學法則或政治經濟學法則都一樣——了解爲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這些法則，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但是人們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法則，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學法則。

這是不是說，例如，自然法則發生作用的結果，即自然力發生作用的結果是根本無法防止的，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以自發的、無可抑制的、不受人們影響的力量而出現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當然，在

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已經認識了它們的發展法則，也確實無力去影響它們。如果把這些過程除外，那末在其他許多場合下，就可能影響自然過程這點來說，人們決不是無能力的。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下，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法則，估計到它們，依靠着它們，善於應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把自然的破壞力引導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的破壞力轉而為社會造福。

我們且從許許多多的例子中舉出一個來看。在上古時代，江河氾濫、洪水、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莊稼的毀滅，曾經認為是無法防止的災害，人們無力加以制止。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人類知識的發展，當人們學會了修築堤壩和水電站的時候，就能使社會防止在從前看來是無法防止的水災。不但如此，人們還學會了制止自然的破壞力，可以說是學會了駕御它們，使水力轉而為社會造福，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

這不是說，人們就因而廢除了自然法則、科學法則，創造了新的自然法則、新的科學法則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問題在於防止水力的破壞作用並利用它來為社會謀福利的這一整個程序，是絲毫沒有違反、改變或消滅科學法則，絲毫沒有創造新的科學法則的。恰恰相反，這一整個程序是確切地根據自然法則、科學法則而實現的，因為對自然法則的任何違反，即使是極小的違反，都只會引起事情的混亂，引起程序的破壞。

對於經濟發展法則，對於政治經濟學法則，——無論是資本主義時期或社會主義時期都一樣，——也必須這樣說。在這裏，也如在自然科學中一樣，經濟發展的法則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法則。人們能發現這些法則，認識它們，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把某些法則所發生的破壞作用引導到另一方向，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給予其他正在爭取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法則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但是人們不能消滅這些法則或創造新的經濟法則。

政治經濟學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的法則與自然科學的法則不同，不是長久不變的；政治經濟學法則，至少是其中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在此以後，它們就讓位給新的法則。但是原來的這些法則，並不是被消滅，而是由於出現了新的經濟條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讓位給新的法則，這些新的法則並不是由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而是在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

有人引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引證他如下的這個公式：隨着資本主義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人們將獲得支配自己生產資料的權力，將獲得解脫社會經濟關係壓迫的自由，而成為自己社會生活「主人」。恩格斯把這種自由叫作「被認識了的必然性」。究竟「被認識了的必然性」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人們認識了客觀的法則（「必

然性」之後，將十分自覺地運用這些法則來為社會謀福利。正因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說：

「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法則，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着人們的自然法則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這些法則將被具有完備知識的人們應用，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

可見，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決不是對於那些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消滅現存經濟法則和創造新經濟法則的人們有利的。恰恰相反，這個公式不是要消滅經濟法則，而是要認識它們和善於運用它們。

有人說，經濟法則具有自發性質，這些法則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會在它們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樣說是不對的。這是把法則偶像化，是讓自己去做法則的奴隸。已經證明：社會在法則面前並不是無能為力的，社會認識了經濟法則以後，依靠它們，就能限制它們發生的範圍，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並「駕御」它們，正如在自然力及其法則方面所發生的情形一樣，正如上面所舉的江河氾濫的例子表明的情形一樣。

有人援引蘇維埃政權在建成社會主義方面的特殊作用，彷彿這種作用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去消滅現存的經濟發展法則，並「制定」新的經濟發展法則。這也是不對的。

蘇維埃政權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兩種情況來說明的：第一，蘇維埃政權不是以另一種剝削形式去代替一種剝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樣，而是消滅了任何剝削；第二，由於國內缺乏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當時必得在可以說是一「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這個任務無疑是困難而複雜的，是沒有先例的。然而，蘇維埃政權光榮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並不是因為它似乎消滅了現存的經濟法則，「制定」了新的經濟法則，而僅僅是因為它依靠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以前我國的生產力，特別在工業中的生產力，是具有社會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資本主義的。蘇維埃政權依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把生產資料公有化了，使之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因而消滅了剝削制度，創造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如果沒有這個法則，不依靠這個法則，蘇維埃政權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的。

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經濟法則，早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爭取為自己開闢道路。它之所以還沒有給自己開闢出道路，還沒有獲得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這是因為它遇到了社會衰朽力量極強烈的反抗。在這裏，我們碰到了經濟法則的另一個特點。在自然科學中，發現和應用新的法則是或多或少順利地進行的；與此相反，在經濟學領域中，發現和應用那些觸犯社會衰朽力量利益的新的法則，却要遇到這些力量極強烈的反抗。因此，必須有能夠克服

這種反抗的力量，社會力量，在我國，找到了這種力量，其形式就是佔社會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這種力量在其他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中還沒有找到。蘇維埃政權之所以能够粉碎了舊的社會力量，而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宜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之所以在我國獲得了發生作用的充分廣闊場所，其秘密就在於此。

有人說，我國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的必然性，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來消滅現存的經濟法則和創造新的經濟法則。這是完全不對的。不能把我們的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跟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法則混為一談。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它是當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法則失去效力以後，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它之所以發生了作用，是因為只有在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經濟法則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才能進行。這就是說，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以完備的知識去應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劃。不能說，我們的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都完全反映出這個經濟法則的要求。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干經濟法則，連價值法則也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法則。這也是不對的。法則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的法則，那也就能消滅法則，而以另外的法則去代替它們了。「改造」法則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法則的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餘。雖然關於改造經濟法則的公式，早已在我們這裏流行起來，可是為了準確起見，必須把這個公式拋棄。可以限制這些或那些經濟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可以防止它們發生的破壞作用（當然，如果有的話），但是不能「改造」或「消滅」法則。

因此，當人們講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經濟力量，講到「控制」它們等等的時候，他們決不是想說：人們能够「消滅」科學法則或「制定」科學法則。恰恰相反，他們只是想以此來說明，人們能够發現法則，認識它們，掌握它們，學會以完備的知識去運用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從而征服它們，求得控制它們。

這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的法則是反映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生活過程的規律性的客觀法則。否認這個原理的人，事實上就是否認科學，而否認科學，也就是否認任何預見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認領導經濟生活的可能性。

也許有人會說，這裏所說的卻是正確的和衆所週知的，可是其中並沒有什麼新東西，因而不值得花費時間來重述衆所週知的真理。當然，在這裏的確沒有什麼新東西，但是如果以為不值得花費時間來重述若干我們熟悉的真理，那就不對了。問題在於，每年有成千的年青的新幹部來接近我們這個領導核心，他們抱着熱烈的願望要幫助我們，抱着熱烈的願望要顯示自己，但是他們沒有受到足夠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不知道我們所熟悉的願望要幫助我們，抱着暗中摸索。蘇維埃政權的巨大成就使他們驚訝，蘇維埃制度異乎尋常的成功衝昏了他們的頭腦，他們就以爲，蘇維埃政權是「無所不能」的，是「什麼都不費力」的，它能消滅科學法則，能制定新的法則。我們對於這些同志該怎樣辦呢？要如何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去教育他們呢？我以為，有系統地重複所謂「衆所週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釋這些真理，便是以馬克思主義教育這些同志的最好方法之一。

## 二、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

某些同志斷定說，黨在我國取得了政權並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後，還保存商品生產，是作得不對的。他們認爲，黨在當時便應當消除商品生產。關於這點，他們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話來作證明：

「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那天商品生產以及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將同時被消除。」（見「反杜林論」）這些同志是大錯特錯了。

我們來分析一下恩格斯的這個公式吧。恩格斯的這個公式不能認爲是十分明確的，因爲其中沒有指出，這裏所說的是社會佔有一切生產資料，還是只佔有一部分生產資料，即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還是僅僅一部分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這就是說，恩格斯的這個公式可以了解成這樣，也可以了解成那樣。

在「反杜林論」的另一個地方，恩格斯講到佔有「一切生產資料」，講到佔有「生產資料的全部總和」。這就是說，恩格斯在他自己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

由此可見，恩格斯所指的是這樣一些國家，在那裏，不僅在工業中，而且也在農業中，資本主義和生產集中都充分發達，以致可以剝奪全國的一切生產資料，並把它們轉歸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認爲，在這樣的國家中除了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以外，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當然是正確的。

在十九世紀末，到「反杜林論」出版的時候，只有英國一個國家是這樣的國家，在那裏，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



義發展和生產中已達到這樣的高度，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就有可能把國內的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並且消除商品生產。

在這裏，我撇開了在英國國民經濟中佔有巨大比重的對外貿易對於英國的意義這個問題。我以為，只有研究了這個問題之後，才能最終解決在英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後商品生產的命運問題。

甚至，不僅在十九世紀末，而且在現時也還沒有一個國家在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生產集中是已經達到了像我們在英國所看到的那種程度。至於說到其餘的國家，雖然那裏的農村中有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可是農村中却還有人數相當衆多的中小私有生產者階級，這些人的命運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應該予以確定的。

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如果在某個國家內，也會在我們國家內，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和推翻資本主義的有利條件已經具備，工業中的資本主義已把生產資料如此集中，以致可以剝奪它們，把它們轉歸社會所有，可是那裏的農業，雖然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却因有人數衆多的中小私有生產者而仍然如此分散，以致沒有可能提出剝奪這些生產者的問題，那末，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該怎麼辦呢？

恩格斯的公式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給予回答。但是，這個公式也不應當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它是在另一個問題的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另一個問題就是，在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以後，商品生產的命運應當怎樣？

因此，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產資料，而僅僅是一部分生產資料，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有利條件又已經具備，那將怎麼辦呢，——無產階級是否應該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以後是否必須立即消滅商品生產呢？

當然，不能把某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叫作回答，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條件下，應該拒絕奪取政權，只有等到資本主義使千百萬中小生產者破產，把他們變為僱農，並把農業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以後，才可以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問題。顯然，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選擇這樣的「出路」的，如果他們不願意使自己丟盡臉皮的話。

也不能把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回答，他們以為，也許應該奪取政權，並着手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走這條荒謬和犯罪的道路，因為這樣的道路就會摧毀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任何可能性，就會把農民長久地拋擲到無產階級敵人的陣營中。

對於這個問題，列寧在關於「糧食稅」的一些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計劃」中，給予了回答。

列寧的回答可以簡括如下：

(甲) 不要放過奪取政權的有利條件，無產階級應該奪取政權，不要等待到資本主義使千百萬中小個體生產者居民破產的時候；

(乙) 剝奪工業中的生產資料，並把它們轉歸全民所有；

(丙) 至於中小個體生產者，那就要逐漸地把他們聯合到生產合作社中，即聯合到大規模的農業企業、集體農莊中；

(丁) 以一切方法發展工業，為集體農莊建立大規模生產的現代技術基礎，並且不要剝奪集體農莊，相反地，要加緊供給它們頭等拖拉機和其他機器；

(戊) 為了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繫的形式，並且要以全力展開蘇維埃貿易，即國營貿易和合作社——集體農莊貿易，把所有的一切資本家從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證明列寧所策畫的這條發展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不容置疑，對於一切具有人數相當眾多的中小生產者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條發展道路是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適當的道路。

有人說，商品生產在任何條件下總還是要引導到而且一定會引導到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並非在任何時候，也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看成一樣。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有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資本家能夠購買它並在生產過程中剝削它，因而只有在國內存在着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制度時，商品生產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生產是在這樣的場合開始的，即生產資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沒有這種情形，就沒有資本主義生產。

但是，如果沒有具備這些使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如果生產資料已經不是私有財產而是社會主義財產，如果僱傭勞動制度已經不存在，而勞動力已經不是商品，如果剝削制度早已消滅，那又怎麼樣呢？可不可以認為商品生產總還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呢？不，不可以這樣認為。要知道，我國社會正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度、僱傭勞動制度、剝削制度早已不存在的社會。

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比資本主義生產更老些。它在奴

隸制度下就存在過，並且替奴隸制度服務過，然而並沒有引導到本資本主義。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過，並且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爲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却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如果注意到，在我國，商品生產沒有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漫無限制和包羅一切地擴展着，商品生產由於生產資料公有的建立、僱傭勞動制度的消滅和剝削制度的消滅等決定性的經濟條件，而受到極嚴格的限制，試問，爲什麼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爲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

有人說，在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建立，而僱傭勞動制度和剝削制度已被消滅以後，商品生產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因此就應該消除商品生產。

這也是不對的。現今在我國，存在着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體農莊的形式。在國家企業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的企業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於國家，可是產品却是個別集體農莊的財產；因爲集體農莊中的勞動也如種籽一樣，是它們自己所有的，而國家交給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土地，集體農莊事實上是作爲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的，雖然它們不能出賣、購買、出租或抵押這些土地。

這種情況就使得國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國家企業的產品，至於集體農莊的產品，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作爲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然而，集體農莊只願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產品轉讓出來，願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繫，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繫，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佈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乃是必要的東西。

當然，在出現了有權支配全國一切消費品的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部門，來代替兩種基本生產部門即國營部門和集體農莊部門之後，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就會作爲國民經濟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但是，只要這個條件還不具有，只要還存在着兩種基本生產部門的時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便應當作爲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必要的和極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樣來建立這種單一的統一的部門呢？是讓國營部門乾脆吞沒集體農莊部門，——而這是很難設想的（因爲這會被了解爲對集體農莊的剝奪），——還是組織統一的全民的（有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代表參加的）經濟機構，即起初有權統計全國一切消費品，而經過一個時期也有權例如以產品交換方式來分配產品的經濟機構呢？這是一個特別的、需要單獨討論的問題。

可見，我國的商品生產並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

生產基本上是與聯合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的商品有關的。它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個人消費品。顯然，它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見是完全不對的，他們宣稱，既然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減商品生產形式，那末在我國似乎就應當恢復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一切經濟範疇：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剩餘價值、資本、資本利潤、平均利潤率等等。這些同志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認為既然有商品生產，就應該有資本主義生產。他們不了解，我國的商品生產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根本不同的。

並且我以為，也必須拋棄從馬克思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的「資本論」中取來而硬套在我國社會主義關係上的其他若干概念。就中我是指這樣的一些概念，如「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必要」產品和「剩餘」產品、「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是爲了說明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泉源、即剩餘價值，並且給予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以推翻資本主義的精神武器。顯然，馬克思在這裏所使用的概念（範疇）是與資本主義關係完全適合的。但是現在，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政權和生產資料，反而掌握着政權和佔有生產資料的時候，還使用這些概念，這是非常奇怪的。現在，在我國制度下，說勞動力是商品，說工人「被僱傭」，這真是十分荒謬的，好像佔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已被自己僱傭，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一樣。現在講到「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也是同樣奇怪的：彷彿在我國條件下，交給社會以便用來擴大生產、發展教育和保健事業以及組織國防等等的工人勞動，對於現在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並不是像用來滿足工人及其家庭的個人需要的勞動那樣必要的。

應該指出，馬克思在他已經不是研究資本主義而是也順便研究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承認交給社會來擴大生產、辦理教育和保健事業、支付管理費、建立後備物費等等的勞動，是與用來滿足工人階級消費需要的勞動同樣必要的。

我以為，我們的經濟學家應當消除舊概念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新情況之間這種不相適合的現象，而用適合新情況的新概念代替舊概念。

我們能容忍這種不適合的現象到一定的時候，但是現在已經是我們應當最後肅清這種不適合的現象的時候了。

### 三、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法則問題

有時人們問，在我國，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法則是不是存在，是不是發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發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也就不能沒有價值法則。

在我國，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過買賣的商品交換，包括主要是個人消費的商品的交換。在這裏，在這個領域中，價值法則當然是在一定範圍內保持着調節者的作用的。

但是，價值法則的作用，並不限於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時也適用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法則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並沒有調節的作用，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問題在於，爲了抵償生產過程中耗費的勞動力而必需的消費品，在我國是作爲受價值法則支配的商品來生產和銷售的。也正是在這裏可以看出價值法則對生產的影響。因此，在我們的企業中，這樣一些問題，如經濟核算和贏利問題、成本問題、價格問題等等，就具有現實的意義。所以，我們的企業是不能不而且不應該不考慮到價值法則的。

這好不好呢？這並不壞。在我國現今條件下，這的確不壞，因爲這種情況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來合理進行生產，並使他們遵守紀律。其所以不壞，是因爲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計算生產量，精確地計算生產量，並且同樣精確地估量生產中的現實事物，而不去侈談憑空想出來的「大概數字」。其所以不壞，是因爲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尋求、發現和利用生產內部潛在的後備力量，而不去糟塌它們。其所以不壞，是因爲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不斷地改進生產方法，降低生產成本，實現經濟核算，並使企業能夠贏利。這是很好的實踐的學校，它加速我們經濟工作幹部的成長，加速把他們變成現今發展階段上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領導者。

糟糕的並不是價值法則影響我國的生產。糟糕的是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和計劃工作人員，除了少數的例外，對於價值法則所發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這種作用，不替於在自己的核算中考慮這種作用。這的確也就說明，爲什麼在價格政策問題方面，我國還存在有一些混亂現象。這裏是許許多多例子中的一個，不久以前，爲了植棉業的利益，曾經決定調整棉花和穀物的比價，確定售給種植棉者的穀物價格，並提高交售給國家的棉花價格。於是，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和計劃工作人員就提出了不能不使中央委員們驚異的建議。因爲按照這個建議，一噸穀物的價格差不多和一噸棉花的價格一樣，同時一噸穀物的價格和一噸麵包的價格相等。中央委員們指出：由於磨粉和烘烤的額外費用，一噸麵包的價格應當高於一噸穀物的價格；棉花一般應當比穀物值錢得多，棉花和穀物的世界市場價格也證明了這一點。而建議人對於中央委員們的這些意見，沒有能夠說出任何明白的道理來。因此，中央只得親自來處理這件事情，降低穀價，提高棉價。假如這些同志們的建議獲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結果會怎樣呢？那我們就會使植棉者破產，就會沒

有棉花。

然而，這一切是不是說價值法則在我國有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同樣廣闊的發生作用的場所，價值法則在我國是生產的調節者呢？不，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在我國的經濟制度下，價值法則的作用是被嚴格地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的。前面已經說過，在我國的經濟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活動，是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的。關於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也必須這樣說。無疑地，在城市和農村中，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把生產資料公有化，就不會不限制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及其對生產的影響程度。

在同一方向發生作用的，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按比例的）發展的法則，這個法則代替了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

在同一方向發生作用的，是我國的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及我國一般的整個的經濟政策，它們都是以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法則的要求為依據的。

這一切就使得價值法則在我國發生作用的範圍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在我國的制度下，價值法則不會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

這的確也就說明了這個「令人驚異」的事實：雖然我國的社會主義生產有不斷的和蓬勃的發展，價值法則在我國卻沒有引導到生產過剩的危機，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廣闊作用範圍的同一個價值法則，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發展速度很低，却引導到週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有人說，價值法則是一切歷史發展時期都一定適用的恆久的法則。如果價值法則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二階段時期會喪失其為交換關係調節者的效力，那天它在這個發展階段中仍將保持其為各個不同生產部門關係的調節者、各個不同生產部門勞動分配的調節者的效力。

這是完全不對的。正如價值法則一樣，價值是與商品生產的存在相關聯的一種歷史範疇。商品生產一消失，價值連同它的各種形式以及價值法則，也都隨之消失。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上，用於生產產品的勞動量，將不是以曲折迂迴的方法，不是憑藉價值及其各種形式來計算，如像在商品生產制度下的情形那樣，而是直接以耗費在生產產品上的時間數量、鐘點數量來計算的。至於說到勞動分配，那末各個生產部門間的勞動分配，將不依靠那時已失去效力的價值法則來調節，而是依靠社會對產品的需要量的增長來調節的。這將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裏，生產將由社會的需要來調節，而計算社會的需要，對於計劃

機關將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下面這個論斷也是完全不正確的，就是說在我們現今的經濟制度下，即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第一階段上，價值法則彷彿調節着各個不同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的「比例」。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沒有用全力去發展那比起往往贏利較少而且有時簡直不能贏利的重工業說來是能贏利的輕工業？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不關閉許多暫時還不能贏利、而且工人的勞動在其中不能產生「應有效果」的重工業企業，也不開設確實能贏利、而且工人的勞動在其中能產生「巨大效果」的輕工業的新企業？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不依據彷彿調節着各個不同生產部門間的勞動分配的「比例」的價值法則，把工人從對於國民經濟雖很需要但贏利很少的企業，調到更能贏利的企業中去？

顯而易見，如果追隨着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們就不得不把生產資料生產的首要地位讓給消費資料的生產。然而，放棄生產資料生產的首要地位，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消滅我國國民經濟不斷增長的可能性，因為如果不同時實現生產資料生產的首要地位，就不可能造成國民經濟不斷的增長。

這些同志忘記了，價值法則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之下，在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生產過剩的危機存在之下，才能是生產的調節者。他們忘記了，在我國，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是被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的作用所限制的，因而，也被大致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我國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所限制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結論說，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與國民經濟的計劃化，消滅着生產贏利的原則。這是完全不對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不從個別企業或個別生產部門的觀點，不從一年的時間來考察贏利，而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觀點，從比方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來考察贏利（這是唯一正確處理問題的方法），那末，個別企業或個別生產部門暫時的不牢固的贏利，就決不能與牢固的經久的高級贏利形式相比擬，這種高級贏利形式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法則的作用及國民經濟計劃化所提供給我們的，因為它們使我們避免那種破壞國民經濟並給社會帶來巨大物質損害的週期的經濟危機，而保證我國國民經濟有高速度的不斷增長。

簡略地說：不容置疑，在我國現今的社會主義生產條件下，價值法則不能是各個不同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方面的「比例調節者」。

### 四、關於消滅城市和鄉村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對立的問題以及關於消滅它們之間的差別的問題

這個標題涉及許多本質上互不相同的問題，但是我把它們都合併在一章中，這不是把它們混為一談，而唯一是爲了闡述上的簡要。

關於消滅城市和鄉村間、工業和農業間的對立的問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問題。這個對立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業、商業、信貸制度的整個發展進程使鄉村遭受城市剝削，使農民遭受剝奪，使大多數農村人口遭受破產。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和鄉村間的對立，應該看作是利益上的對立。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農村對城市、對一般「城裏人」的敵對關係。

無疑地，在我國，隨着資本主義和剝削制度的消滅，隨着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而城市和鄉村利益的對立、工業和農業利益的對立也必定消失。事情也正是這樣發生的了。社會主義城市、我國工人階級在消滅地主和富農的事業上所給予我國農民的巨大幫助，鞏固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的基礎，而有系統地給農民及其集體農莊以頭等的莊拉機和其他機器，更使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變成了他們之間的友誼。當然，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仍然是兩個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階級。但是這個差別絲毫不削弱他們的友誼關係。恰恰相反，他們的利益是位置在一條共同線上，位置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共同線上。因此，過去鄉村對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對城市的憎恨，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了，這是毫不奇怪的。

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鄉村間、工業和農業間的對立的基礎，已經被我國現今的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當然，這不是說，城市和鄉村間對立的消滅應當引導到「大城市的滅亡」（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不僅大城市不會滅亡，並且還要出現新的大城市，它們是文化最發達的中心，它們不僅是大工業的中心，而且是農業產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業部門強大發展的中心。這種情況將促進全國文化的繁榮，並使鄉村的生活條件向城市看齊。

關於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的問題，我們有類似的情況。這個問題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問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經濟基礎，是腦力勞動者對體力勞動者的剝削。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中體力勞動者與領導人員之間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對待廠長、工長、工程師及其他技術人員就



好像對待自己的敵人一樣的那種敵對態度，就是在這個分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顯然，隨着資本主義和剝削制度的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利益的對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國現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確實也消失了。現在體力勞動者與領導人員並不是敵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個統一生產集體的成員，都極端關心生產的進步和改善，他們之間過去的仇視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至於消滅城市（工業）和鄉村（農業）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的差別的問題，却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被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家們提出來過。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所提出的新問題。

這個問題是不是臆造出來的呢？它對於我們有沒有什麼實踐的或理論的意義呢？決不能把這個問題看作是臆造出來的。恰恰相反，它對於我們是極其重要的問題。

例如，如果拿農業和工業的差別來說，那末在我國，這種差別不僅由於農業的勞動條件與工業的勞動條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由於在工業中我們有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農業中我們却沒有全民所有制，只有集團的、集體農莊的所有制。前面已經說過，這種情況引導到商品流通的保存，只有工業和農業間的這個差別消失時，商品生產及其一切後果才會隨之消滅。因而，不能否認，農業和工業間的這個本質差別的消失，對於我們應當有頭等重要意義。

關於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本質差別的問題，也必須這樣說。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也有頭等重要意義。在開始展開羣衆性的社會主義競賽以前，我國工業的發展是進行得並不順當的，有許多同志甚至提出了要降低工業發展速度的問題。這主要是由於當時工人的文化技術水平太低，遠遠落後於技術人員的水平。然而當社會主義競賽在我國已具有羣衆性的時候，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正是在這以後，工業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邁進了。爲什麼社會主義競賽具有了羣衆性呢？因爲在工人間有了整批整批的同志，他們不僅掌握了基本的技術知識，而且更前進了，與技術人員站在同一水平上，開始糾正技師和工程師的缺點，打破已經陳舊的現行定額，採用新的更加現代化的定額等等。假如不是少數工人，而是大多數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術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術人員的水平，結果會怎麼樣呢？那我國的工業就會提高到其他各國工業所不能達到的高度。因而，不能否認，用提高工人文化技術水平到技術人員水平的辦法，來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的本質差別，對於我們是不能有頭等重要意義的。

某些同志斷定說，經過一個時期，不僅工業和農業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的本質差別會消失，而且它們之間的任何差別也會消失。這是不對的。工業和農業間本質差別的消滅，不能引導到它們之間任何差別的消滅。由於工業